

##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70年(上)

◎张锦胎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少数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儿童文学这块小园地里,兄弟民族各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各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经历了艰难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独特的发展画卷。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得到了国家的肯定、社会的鼓励,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少数民族中,老作家们义不容辞地担起为儿童创作的责任。他们向孩子们讲述,为了推翻压迫各民族人民的反动统治,革命前辈前赴后继,儿童们也勇敢无畏、不怕牺牲。这方面作品有蒙古族岗 普日布的《小侦察员》、布依族江农的《血染山茶寨》、满族颜一烟的《小马信和大皮靴叔叔》等。而苗族作家杨明渊的《芦笙的故事》,则是写苗族英雄英勇抗击清朝大兵的历史故事,布依族王廷珍也写了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剿匪斗争的《山谷月明夜》。这些作品大都是老作家们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作品丰富而凝重,惊险而曲折,使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与之并进的,还有老作家们描写新社会、新生活、新儿童,以及新儿童的新思想、新行为的现实题材小说。如蒙古族阿 敖德斯尔生动描绘草原上新一代牧民儿童的《小风苏赫》,彝族苏晓星描绘彝族孩子热爱集体创作的《阿爹与莽莽》。彝族普飞则创作出以第一人称描写我和我全家像对待家人一样地呵护一只八哥鸟的作品《七弟的翅膀》,因其真实、真切而感人至深。回族胡奇创作了描写解放军修筑公路到西藏的《五彩路》。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写出不同民族儿童心驰神往于热火朝天的新生活,他们的所想所做都令人耳目一新,也由此反映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昂扬精神和热切期待。

各民族老诗人们,或借鉴民族民间传说、童话,写出长长短短、好听好读的故事诗,如蒙古族其木德道尔吉的《巴林驹》、满族胡昭的《雁鸣》《响铃公主》、壮族韦其麟的《百鸟衣》,或根据家乡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写出颂扬党和祖国、弘扬民族、时代精神的抒情诗,如蒙古族纳 赛音朝克图的《沙原,我的故乡》、巴 布林贝赫的《理想》,哈萨巴拉的《我的祖国》,满族柯岩的《小兵的故事》、中申的《城外的白杨》;或顺应各民族儿童好奇、好动的天性,写探索自然、追究万物的幻想诗,如佟族包玉堂的《虹》等。虽风格各异,都呈现出爱党爱国的新风貌,洋溢着向上向善的新的民族情感。

这时的儿童散文,则多描写大自然,多描述祖国的地理景象,引导儿童开阔眼界、热爱生活,作品大都清新隽永、活泼灵动。回族郭风致力于创作优美的、富于乡土气息的儿童散文,接连出版散文集《搭船的鸟》《会飞的种子》《洗澡的虎》,赫哲族白辛在走遍祖国大西北之后写出了《帕米尔高原历险记》。乌白辛还接着创作了无场次话剧《黄继光》,竟连演300余场,崇拜英雄、学习英雄的热潮在全社会掀起。东北地区反映新社会新儿童的短剧创作在这时十分活跃,如满族柯岩的小歌剧《娃娃店》《镜子》、赵郁秀的独幕剧《五条红领巾》等。

需要提到的是,那时新中国各民族青少年几乎没有不读苏联文学的,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家自然也深受影响,除了了解战争中的小英雄、各条战线上的小模范,还关注了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少年儿童们,如朝鲜族金昌锡的短篇小说《飞鸽传深情》、白族蓝芳的短篇小说《界河上的红蜻蜓》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在文艺百花园中,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虽是一枝嫩生小花,却也是花蕊饱满、花瓣展开。满族颜一烟、回族胡奇、蒙古族阿 敖德斯尔的小说、满族胡昭、柯岩的诗歌、回族的散文等等,不仅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形成了在整个文学史上能与其他阶段区别开来的艺术个性。毫无疑问,这是新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

初,各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努力把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力图真实、细致和深刻地表现生活,或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历史为背景,或以边疆少数民族儿童独特的生活为题材,或以南北各民族中的创世神话、美丽传说为参照,或以边陲广阔原野上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现实为依据,写出为各民族儿童所喜爱的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以蒙古族作家来说,内蒙古土默特旗云照光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大青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亲身经历,写出中篇小说《蒙古小八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哈萨巴拉,写出蒙古族小奴隶觉醒、反抗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故事中的乌塔》,青海老作家蔡森放拉,创作了在长期游牧生活中积淀、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在代代传承中得以发扬、光大的《祁连山牧歌》,阿 敖德斯尔写出了反映新中国内蒙古草原的巨大变化,以及新一代蒙古族儿童新的生活状态、新的思想风貌的《草原童话》《雪花飘飘》,巴 布林贝赫写出长诗《阳光下的孩子》,其木德道尔吉依据民间的美丽传说写出动人的长诗《独角兽鹿》等等。可见,当时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已有了新的进步。

这时,少数民族中的老作家们,也顺势创作。如满族作家老舍,写了六场童话歌剧《青蛙骑手》、六场童话剧《宝船》,都以民间童话故事为素材,有情趣,有神韵,经久不衰。如回族胡奇写出因袭宗教重负的藏族少年觉醒的中篇小说《绿色的远方》。满族佟希仁深情地描写大自然,诗集《柳树挂月亮》《孔雀与白头翁》,表达出少年儿童爱家乡、爱祖国的真情实意,抒写少年儿童有理想、有志向的精神。其他如锡伯族郭基南的地域小诗《伊犁春色》、白族那家伦的人物散文《怒米渡口》、蒙古族阿 敖德斯尔的抒情散文《慈母湖》《马驹湖》等,都保持着文学的审美和心灵的纯净,为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国家对儿童文学事业更加重视,加上《民族文学》杂志的创办,以及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扶持民族文学创作等有关政策的出台,使民族儿童文学作家深受鼓舞。老作家如颜一烟、舒群、郭风、胡奇、白练、柯元武、夏木斯 胡玛尔、吉儒木图等焕发青春,积极创作,中壮年民族作家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如柯岩、胡昭、佟希仁、张少武、额 察 力格登、石 础伦巴干、高 拉希扎布、孙健忠、韦其麟、黄钰、益希丹增等,青年一代民族作家成长较快,锐意创作,如意西泽仁、王家男、艾克拜尔 米吉提、穆罕默德 巴格拉西、李传锋、蔡测海、颜家文、杨盛龙、贺晓彤等,新时期民族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壮大,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呈现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民族特色。其主要表现:

一、作品真实、生动地写出民族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民族作家独特的民族生活经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题材优势。长篇如颜一烟的《盐丁儿》、中篇如佳峻的《骆驼》、黄钰的《江和岭》,短篇如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础伦巴干的《三个小伙伴和三个小伙伴》、益希丹增的《啊,人心》、白练的《儿童文学三题》、夏木斯 胡玛尔的《长满蒿草的原野》、李传锋的《退役军犬》、王云龙的《爸爸在遥远的扣林》等等。

二、对民族特征、民族特色的理解、表达更加深入、更为深刻,写出了时代迅猛发展中各民族人民在社会变动中始终坚守的文化心理,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开阔的现实感,使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更具当代性和民族性。如同是满族作家写的长篇《盐丁儿》、中篇《九月的枪声》、短篇《松花湖上》,同是蒙古族作家写的长篇《成吉思汗传》、中篇《骆驼》、短篇《鸢雕》;不同民族作家写的处于同一年龄段的民族儿童生活、情感的小说《依姆琼琼》《儿童文学三题》《牛牛的故事》《小伙伴》《界河上的红蜻蜓》等等,作品中塑造的不同民族儿童人物形象都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与儿童精神的融合。民族精神因时代精神的灌注、因儿童精神的浸润而显示出它的新发展,民族儿童人物形象,也因此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显示出他们的独特性。

三、正确的民族观、儿童观得以确立,民族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得到爱护和尊重。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如小说《孩子和割草的人》《依姆琼琼》《天鹅》《小火龙》《爱的渴望》、散文诗集《你是普通的花》《童心集》等等,都呈现出新时期民族儿童文学艺术性的意蕴和意义。民族儿童文学艺术性与思想性、与民族性、与时代性、与儿童性熔铸一炉,达到了新高度。

新时期民族儿童文学开辟了一方新天地,不少民族儿童文学作品已被写进《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其中,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乌热尔图的《七叉角的公鹿》已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些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正在于思想、艺术上的开创性、开拓性。

### 四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在题材的拓展、题目的深化,以及艺术方式的多元、文学语言的个性化等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从1987年起,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陆续出版南北方各民族民间童话丛书,199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故事精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故事精选)(一套两本);同年海燕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儿童小说选》,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儿童小说选集;1998年,《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新作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中,辑入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品就有中篇小说3部:蒙古族佳峻的《骆驼》、壮族黄钰的《江和岭》、朝鲜族柳元武的《我们的老师》,短篇小说七篇:维吾尔族穆罕默德 巴格拉西的《流沙》、土家族李传锋的《退役军犬》、藏族益希丹增的《啊,人心》、白族王云龙的《爸爸在遥远的扣林》、藏族意西泽仁的《依姆琼琼》、佤族董秀英的《最后的微笑》、景颇族岳丁的《爱的渴望》,以及土家族颜家文的诗歌《悲歌一曲》等。事实证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确的民族观、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已逐步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为儿童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渐多,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走向繁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老作家们笔耕不辍。满族舒群创作出版了纪实文学集《毛泽东的故事》,蒙古族阿 敖德斯尔写出中篇小说《云青马》《狗坟》,数位作家出版了儿童文学作品集,如鄂温克族乌热尔图的《七叉角的公鹿》、蒙古族石 础伦巴干的《啊,妈妈》、白族张焰的《洱海的孩子》、彝族普飞的《普飞儿童文学作品选》《蓝宝石少女》、土家族李传锋的《动物小说选》、满族佟希仁的《佟希仁儿童诗选》、儿歌集《蒲公英》、散文集《五十双眼睛》、满族赵郁秀的散文、报告文学集《为了明天》、蒙古族额 巴雅尔的散文集《天涯归心》、回族海岱泉的寓言集《螃蟹为什么横行》《老友狼作报告》、回族马瑞麟的寓言选《猫鼠》等。有的作家出版了中、长篇单行本,如哈萨克族存文学的中篇小说《神秘的黑森林》、蒙古族哈萨巴拉等的长篇纪实文学《成吉思汗》、蒙古族乌 达尔罕的中篇小说《警犬黑豹》、土家族向民胜的长篇童话《外星猫人阿木哥》,以及蒙古族巴根那的长篇小说《雪灾之后草青青》等,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在走向丰富和成熟。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民族儿童文学作品中,明显地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气息,从各民族少年儿童生活和情感的变化中,反映出中国大地的变动和变革。如维吾尔族艾克拜尔 吾拉木的短篇小说《卖哈密瓜的小姑娘》、侗族刘蓉宝的短篇小说《小河流水清亮亮》,以及彝族普飞的大自然散文《再见吧,扎腊么鸟》《神奇的鸟童》《蜜花》《青罗毡和小罗毡》、藏族贡 卜扎西的短诗《阿妈要摘的星》《童心》等。有一些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使各民族的读者都感同身受,如哈萨克族吾玛德力 马曼的短篇小说《宁静的草原上》、朝鲜族崔清吉的短篇动物小说《林中悲曲》等。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 万物万般模样

读《万物的样子》有感

◎任志鸿

万物是什么样子?读了《万物的样子》本能地就想给触目所及的每一种物体都命名为一篇文章的题目,甚至有举办一次同题创作笔会的冲动,就是大家落笔于同一事物,看看你的土豆里埋藏着怎样的童年记忆,或是我的洗头膏里氤氲着怎样芬芳难忘的往事,大家各自隐在一个具体的事物里,找到代言的突破口,信笔拈来地娓娓诉说上几千字才觉得酣畅痛快。《道路的样子》《流水的样子》《编辑的样子》《知己的样子》《钞票的样子》《米饭的样子》...一时间,思维活跃起来。原来,万物会有万般模样,一切的存在都有它安身立命的理由,万物自有它本来的样子。

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人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为什么一本《万物的样子》风靡了通辽的读者群?不仅仅因为作者是在通辽生活且工作的达斡尔族作家,而是因为作者将笔触落在寻常万物上,酸菜的样子、土豆的样子、地瓜的样子、豆包的样子、洗头膏、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都是陪伴我们长大的老物件,都是慰藉我们肠胃的舌尖上的记忆!谁能忘记?但是我们不曾把他们诉诸笔端,苏莉却做到了,她不仅完成了自己倾诉创作的目的,完成了精神上的归乡之旅,也唤醒了众多有同样经验的人集体的回乡意识。所以,读者纷纷感叹,苏莉写出了我们共同的生活记忆,我们也是在这些万物的滋养中,经由万物回归了自己。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曾深陷苏莉笔下的人间烟火中。因为一篇《酸菜的样子》,我忆起了我的老母亲在每年秋季腌菜时那大张旗鼓的气势,为寻来一块压缸青石而兴高采烈的情景,还有我的姨妈挽起袖子把手伸到清冽的酸菜缸里拎出一大颗水淋淋的酸菜的样子,这就是苏莉所描写的全是自己家亲切熟悉的画面,而且鼻翼不自觉地扇动起来,耳鼻喉舌的感官都调动起来,我仿佛闻到了酸菜清新酸爽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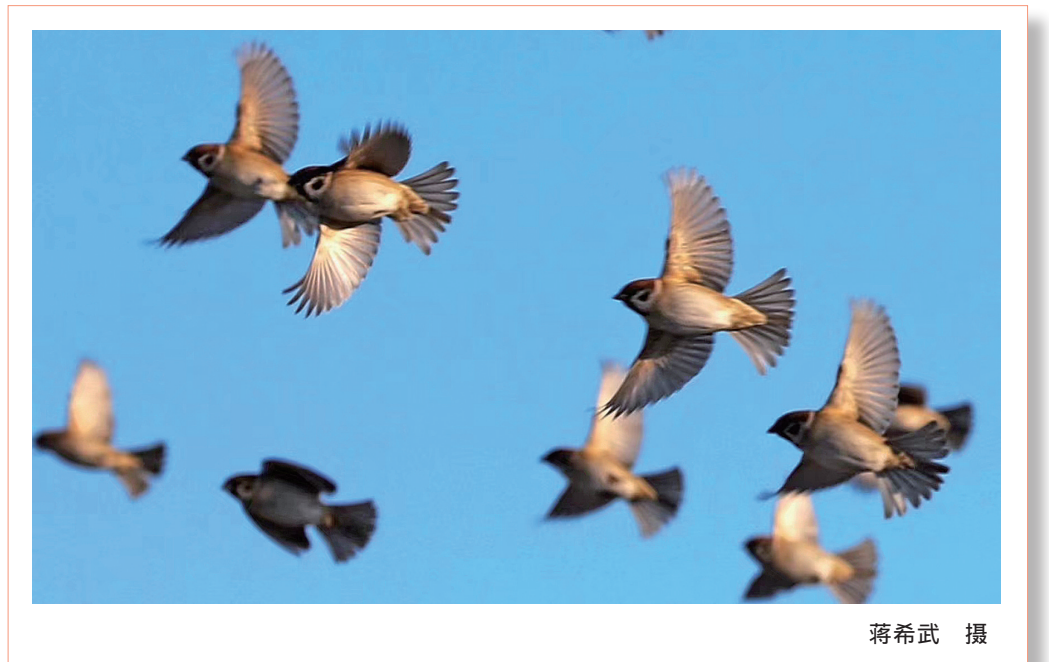
读《万物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又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略有不同的世界。其中

的达斡尔民俗风情让人着迷。《老樟和干菜》在作家的叙述里,既展示了一幅达斡尔族的风情画卷,也把血浓于水的亲情融汇贯通,有一种格外打动人心的温暖力量。《林地居民》看似游记随笔一般,一篇篇各自独立,却首尾呼应成趣,最适合一气呵成地读,就像欣赏一幅组画,欣赏完毕才会发现《林地居民》那种看似游离、肌理相连相通的构思组合,你会发现土泡、巴嘎、维佳、宋老师,还有驯鹿,甚至桦树、撮罗子,他们都是一个密不可分整体,好像受了某种神秘的指令成为山林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万物的样子》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我由这本书想到作家本人。有人形容苏莉:左手烟火,是温暖尘世的人间烟火;右手文学,是滋养心灵的挚爱文学。她是主妇、贤妻、慈母,并自喻神医、水暖工、女汉子。为了生活,她披挂满身盔甲,但她从未丢弃内心的柔软,文学支撑着她,也引导着她,经由万物回归了自己。就是她,一边和面一边写出《面粉的样子》;一边排队购买燃气,一边写出《火的样子》;除夕夜一边听着鞭炮声,一边想起给我肉肉的故乡,写出《年的样子》。苏莉,这个养花花开、烙饼饼香的传奇女子,她的日子就像她的散文《滋啦》一样,色香味俱全,闪着油光,飘着香味,滋滋作响,仿佛一团绚丽的人间烟火。

也因此,我愿意称苏莉是烟火作家。主妇的样子,作家的样子,不是超凡脱俗的,而是接着地气,从大地而生,有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万物总是以它应有的样子存在着、生长着,也许是大地上,也许是空间里,也许是我们的记忆里。无论何种形态,它们生生不息,永不消亡。



蒋希武 摄

## 古诗长短趣谈

◎张朝元

大家读古诗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发现与疑问:古诗的篇幅有长有短,其长短可以用来判定一首诗的优劣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品读古诗。

白居易是写长诗的能手。在我看来,白居易之所以能和李白、杜甫并称唐诗三大家,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于村妇都能诵颂的新乐府,而在于《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即便放眼全部诗史,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也堪称独领风骚。《长恨歌》《琵琶行》的妙处,在当时简直就是周杰伦唱《东风破》和《双截棍》的节奏,大家街头传唱,把长诗的绽放之美推向极致。所谓盛极难继,一直到白居易身后800年,清人吴梅村才写出《圆圆曲》,勉强继承了《长恨歌》《琵琶行》的风格。可见诗要写得长而好,并不是很容易的。

诗不必长,也不必短。长不为丰,短不为俭,反之亦然。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二人并称元白。同样是写唐明皇的故事,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行宫》各有长短之妙,可谓相映成趣。《长恨歌》自 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笔,华清池、马嵬坡、剑阁闻铃、钗钿重逢,一路铺排,繁花密叶,简直是韵文的唐传奇。《行宫》则短到不能再短,寥寥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寥寥四句,如同一幅淡远的古画,惟物是人非,红花白首,悲凉离合,细思恐极。

杜甫善写组诗,以短章合为一组,《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俱是。其中,《秋兴》八首,整体性尤强,几乎不可拆分,可以作长诗看。杜甫的诗,本来就沉郁顿挫,见长,再加上八首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其中往来顺逆,消息机变,真有神鬼莫测之概。过去梨园行有这样的一种说法,40岁以前不能演诸葛亮,因为人物太复杂,没有相当的生活阅历,拿不下来。借着这个说法,我觉得40岁以前是读不懂《秋兴》的,理由同上。总而言之,老杜的组诗,可以算是长诗的变例,开

风气之先河。以兵器论,长篇如长枪大戟,短章如短剑细芒,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每次读到李白的《关山月》,总是不禁掩卷叹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要是到此终篇,该是多么雄浑壮阔的一首五古啊!接下来八句,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征戍思归之叹,篇幅长了,力道弱了。你看,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雕琢多么用力,对仗多么工整,白和青的借对多么巧妙。但这都已于无力回天。从全篇看,这首《关山月》不过是唐诗里的中平之作,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更是黯然失色。

李白纵称奇才,不受格律束缚,所以他的乐府和歌行极好。你看他的《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真如怀素和尚的狂草,公孙大娘的剑器一般,龙凤飞舞,自然天成。也许李白构思这首《关山月》的时候,是想写一首反战诗。但机缘巧合,灵感迸发,前四句挟排山倒海之势脱口而出,这是天作之美,不应再逞人力之强。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古人论诗,有 凑数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关山月》这事儿。

综上,古诗中的篇幅长短其实与诗的优劣是没有联系的,正如一个人的才华与他(她)的年龄大小是没半点关系的。一首诗的优劣,关键在于这首诗该长的时候就长,该短就短,反之,只能成为平庸之作!

